

中國歷代政權轉移對於日韓越的影響

朱雲影

——中國文化圈之歷史的研究（十八）

一

梁啓超先生曾分中國史爲1.「中國之中國」、2.「亞洲之中國」、3.「世界之中國」三時期（註一），而以秦之統一至清乾隆末年爲「亞洲之中國」時期，確是很有價值的卓見。

在自秦至清約二千年間，中國民族是中國歷史舞台的主角，同時也是亞洲歷史舞台的主角，其間中國給與亞洲各國的影響極其複雜，尤以政治方面的影響最爲顯著。試翻開亞洲各國的歷史一看，就不難發現中國政局的演變，常使亞洲各國的政局發生連鎖的變化，中國歷代的治亂興衰，常對亞洲各國的社會投下各色各樣的光影。尤其日韓越各國，由於地理上毗鄰中國，二千年來吸收中國的文化特別積極，受到中國政治方面的影響也特別深刻。

茲試根據日韓越各國的歷史，分別加以檢討。

二

中日兩國間的交通，由來甚古。（註二）論衡卷八儒增篇、卷十九恢國篇，曾一再記載西周時倭人貢鬯之事。論衡寫成於一世紀末，追述千年前的往事，雖然不能輕易信用，但至東周時，中日間已有交通，却是毫不容疑的事實。山海經卷十二海內北經曰：

『南倭北倭屬燕。』

山海經爲周秦間人的著作，其記事應該充分可信。原來戰國時代的日本列島，北爲蝦夷族的祖先所盤據，故曰北倭，南爲大和族、熊襲族的祖先所盤據，故曰南倭。戰國七雄之一的燕國，既將遼東半島據爲己有，朝鮮半島也隨着落入她的勢力範圍，所以南倭北倭和燕國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是很自然的事情。近代考古學家也用鋤頭挖出了證據，可補文獻之不足。在遼東半島的營

城、旅順，朝鮮半島的平安北道寧邊、全羅南道康津，日本的備後三原町、備前邑久郡山手村，都有燕國貨幣明刀出土。此種古錢的分佈，證明了燕國勢力擴張的情形。原來戰國時期，各國爲了爭霸中原，無一不力謀向邊陲擴張，以便增強其國力。燕國勢力之東漸，這是中國政潮首次對日本列島的波及。

秦併六國，創立東亞空前的大帝國，當時亞洲諸鄰國受到很大的震動，自不難想像，秦人富有新興帝國的朝氣，曾向國外大事活躍，也是不難想像。因此，秦人在日本史上也曾留下巨大的足印。日本史家藤田元春說：

『經戰國時代至秦統一天下，她對日本的影響更在燕人之上。秦始皇二十六年平定天下，東巡至泰山及琅邪立碑，追齊之威王、宣王和燕之昭王之跡，遣方士求海上的仙鄉，……由此不難想像，始皇一定會從燕齊海上人士聽過許多關於朝鮮和本的種種事情。而秦朝之銅鐸、銅銓以及細線鋸齒文鏡等物，在我國大和吐田鄉、長門豐浦郡梶栗、以及朝鮮慶州入室，同時出土。此種事實，說明了秦至漢初之間中國文化東漸之情形。』（註三）

史記秦始皇本紀和淮南王列傳，曾記載秦始皇爲了求長生不死之藥，兩次派遣徐福入海，因此過去中日學者不少主張徐福到達了日本。徐福其人曾否到達日本，姑置勿論，但所謂「秦人」，遠在日本國家成立以前即已渡日，却是不容懷疑的事實。日本考古學上的所謂「銅鐸民族」，一般學者多主張爲「秦人」，如栗山周一便是堅持此種主張的一人，他說：

『銅鐸民族的興盛時代，大概以西元前二百年前後爲中心，而可上溯至西元前四五百年。就這點看，秦人說，確是顛撲不破的。因爲小形厚手的古拙銅鐸多發掘於山陰方面，漸延及於北陸，而與由出雲至南韓慶州的銅鐸亦有連絡。且太古時代的交通線，亦由但馬、出雲延伸至朝鮮半島，而模仿大陸系古墳的方墳系統，也散佈在此交通線上……秦人之東渡及其歸化年代，過去的國史都列於有史時代，其實應該是天孫民族及倭國建國以前的事。』（註四）

秦人在文化上對日本的貢獻甚大，這有日史斑斑可考。這些所謂秦人，有的可能是秦全盛時移往日本的，有的可能是秦亡國前後出國避難輾轉東渡的，總之，他們與秦朝有密切的關係，似無可疑。

漢朝代興，經過漢初一段時間的儲積國力，到武帝時，便呈現了空前的發展，『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註五）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古來倭人與朝鮮常有往來，此時朝鮮大部分忽爲武帝所征服，倭人自不免觸目驚心，所以很快便有遣使貢獻的事實。漢書地理志云：

『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又後漢書東夷傳云：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

由此可見自漢武帝滅朝鮮後，日本列島百餘部落中已有三十餘部落遣使通漢。日本史家稻葉君山分析當時的情形說：

『按之彼時之史乘，有樂浪海中倭人遣使來聘者三十餘國之記載，可見當時日本海表搖動之狀矣。此時日本之祖先遣使聘問中國者，雖有種種之意味，由吾人觀之，無非受漢人威力壓迫之所致，而因是以喚起國民之覺醒，遂促起其肇造國家之始基焉。』(註六)

不過史缺有間，當時的詳情已不得而知。文獻可考者，至東漢初年始有倭奴國朝貢之記事。後漢書東夷傳云：

『建武中元二年(五七)，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光武帝賜倭奴國的印綬，已有地下史料加以證實。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在九州福岡志賀郡掘出一顆金印，文曰「漢委奴國王」，蛇鈕，陰文，篆體奇古，經日本學者三宅米吉等的考證，確證為漢印。不過關於「委奴國」的解釋，日本學者意見頗不一致，大體可歸納為二說：一說倭奴國為日本的總稱，即認此印為漢光武頒賜日本朝廷者，龜井南溟的「金印辨」、稻葉君山的「漢委奴國王印考」、內藤虎次郎的「日本文化史」等主之；一說倭奴國為九州的一小國，即認此印為漢光武頒賜倭國中的奴國者，籾井貞幹的「好古日錄」、青柳重信的「後漢金印略考」、伴信友的「中外經緯傳」、三宅米吉的「漢委奴國王金印考」等主之。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有問題。如果倭奴國真是九州一不足輕重的小國，光武帝決不可能賜以王號與金印，過去日本學者所以有此主張，不過為了國家體面而已。至於以倭奴國為大和朝廷，顯然也與事實不符，當時日本還是部落林立，大和朝廷尚不存在。我們看來，倭奴國應該是當時眾多部落中的一個強有力的部落，大概包括九州大部和本州的一部。光武帝頒賜倭奴國以王號與金印，對於部落時代的日本，當曾引起很大的反響，不過史缺有間，今已無從詳考了。

東漢之後，繼以三國鼎立之局。三國為了培養國力，各競向邊疆地區擴大勢力範圍，蜀國以西南雲貴為其勢力範圍，吳國以沿海兩廣交趾為其勢力範圍，魏國則以東北朝鮮為其勢力範圍。魏明帝景初二年(二三八)，司馬懿率大軍征遼東公孫淵，斬淵父子，復濟軍浮海收帶方、樂浪等地，於是遼東朝鮮盡為魏有，一時聲威大震。日本九州的倭人，向來對大陸的局勢非常敏感，當時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為了利用此種新情勢，立即開始遣使向魏朝貢。此後九年間，倭使入貢四次，魏使至日二次。據魏志倭人傳看來，當時日本還是小國林立，處於相當落後的狀態，女王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很像是一位帶有女巫性質的酋長，不過「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死後，「大作冢，徑百餘步，殉葬者奴婢百餘人」，可知當時倭國究已具備國家的雛形。正因處在原始國家的形成期間，特別需要大國的支援，所以倭女王一得到朝鮮的情報，立刻有遣使的計劃。魏景初三年(二三九)六月，遣大夫難升米等獻生口方物，目的顯然在求魏室的冊封，所以次年，魏即派使奉詔書印綬赴倭，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魏之冊封，不僅提高了女王卑彌呼的聲望，也增強了邪馬台國在倭國中的地位。至魏正始八年(二四七)，邪馬台國又遣使入貢，這次遣使的目的，是因為匈奴國男王卑彌呼對邪馬台國一向採取敵視的態度，終於爆發戰爭，情勢非常嚴重，所以卑彌呼特派載斯烏越到魏帶方郡報告交戰的情形，帶方太守得訊，立即派張政等

帶着詔書黃幢渡海勸諭息爭。這在日本史上，實有重大的意義。關於邪馬台國的位置，過去日本史家說法不一，（註七）我們看來，邪馬台國應在九州，她很可能是大和朝廷的前身。大和朝廷後來雖移於本州，其發祥地本在九州。黑板勝美據古事記所載地方的詳略，推明大和民族的蕃衍，其在九州四國者實早於本州（註八）。日本書紀以卑彌呼爲神功皇后，而神功皇后，宋史日本傳作神功天皇。這反映卑彌呼是當時九州大和族的共主，邪馬台國是當時大和族在九州建立的最強部落。邪馬台國的勁敵，是狗奴國。狗奴國爲熊襲族所建立，是多數學者承認的。白柳秀湖說：

『熊襲位於邪馬台國的南方，在日向、大隅、肥後之間，屢與中國及朝鮮交通，而吸收其文明，經過七百餘年，可以說蓄積了對抗日本民族的力量。』（註九）

由此不難想像當時九州的種族戰爭如何激烈。我們必須明白此種情形，才能理解魏室賜給卑彌呼封號的重大意義。由於邪馬台國獲得魏的支持，大和族纔得鞏固了種族領導權。魏室賜給卑彌呼的詔書，一則曰：「汝之忠孝，我甚哀汝。」再則曰：「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說明魏室對於大和族的邪馬台國，曾表示如何的關切與愛護。

三世紀中葉後，中國局勢發生巨大變化，魏亡於晉，隨即發生五胡之亂，因此引起漢族的大遷徙，終於形成南北長期的混戰。東亞各國受此影響，也分別出現了新的情勢。朝鮮方面，中國勢力完全被迫退出，北部的高句麗和南部的百濟、新羅，形成三國鼎立之局。日本方面，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死後，一個十三歲的少女壹與繼立爲王，壹與以後的情形，國史失載，可得而知，從三世紀下半葉至五世紀初，倭人來朝只有兩次，一爲西晉武帝泰始二年（二六六），一爲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四一三），其間相隔約一百五十年，倭人沒有來朝。這段期間，對於倭人非常重要。大概他們就是利用這段期間奠定了大和朝廷統一全國的基礎。他們一面趁五胡亂華漢人絡繹東渡的機會，吸收中國的人才技術，充實國力，一面東征西討，進行武力統一工作。隨着軍事的進展，大和朝廷便由九州遷至畿內，所謂神武東征，大概就是反映此種史影的傳說。後來倭王武上劉宋順帝的表文中，稱其祖先「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註一〇），應該就是這期間的事情。所謂毛人，即指蝦夷，所謂衆夷，即指熊襲，所謂海北，即指朝鮮。「渡平海北」之說，在考古學上也得到了證明。高句麗廣開土好太王陵碑載：

『倭以辛丑年（三九一）來渡海，破百殘（濟）新（羅）以爲臣民。』

可知倭人於四世紀末確曾利用中國退出朝鮮半島的真空大舉侵入，不過到五世紀初，倭人終被新興的高句麗驅逐下海了。

五世紀初，中國漸結束混戰的局面，開始形成南北兩個政治重心，進入南北朝時代。當時，日本今皇室之祖既統一日本，復進而謀立足於朝鮮，因此屢有聘問南朝之舉。據宋書夷蠻傳等所載，劉宋約六十年間，倭國朝貢十次，先後包括倭王讚、珍、濟、興、武五代。首先倭王讚於宋高祖永初二年（四二一）遣使修貢。及讚死，弟珍立，又於元嘉十五年（四三八）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其後倭王

濟於元嘉二十年（四四三）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元嘉二十八年，始准倭王之請，詔除濟「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進號安東大將軍」，但除去百濟，另補加羅，湊足六國之數。及濟死，世子興即位，於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四六二）遣使貢獻。興死，弟武立，又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遣使上表並獻方物，宋順帝昇明二年（四七八），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仍除去百濟，改七國爲六國。五倭王朝貢中國的主要目的，是在武力經營朝鮮半島失敗之後，想借中國的聲威號令諸國，只看其請求都督軍事的國家，除倭國外，六國都在朝鮮半島，便是證明。但劉宋雖然偏安江南鞭長莫及，當初仍無意承認倭國的要求，後來因南北戰爭情勢不利，才不得已做一個順水人情，但距倭國首次提出要求已十餘年了。如果當時不是南北分裂，劉宋決不可能同意倭國的要求；而且六國中最大的百濟，劉宋始終拒絕劃入倭王的勢力範圍，由此也可看出劉宋防倭的苦心。（註一一）宋書所載五倭王，據吉田東伍等的考證，便是日本史上仁德（讚）、反正（珍）、允恭（濟）、安康（興）、雄略（武）五天皇（註一二）。這是日本今皇室之祖對中國朝貢可考的最早史實。當時倭王既欲經營朝鮮半島，而朝鮮半島更毗鄰北朝，爲什麼倭王卻捨北朝而朝貢南朝？這正如木宮泰彥所說：「北朝所佔之土地雖係中原，而其人則左衽之索虜，南朝雖居島夷之地，而其人則開化之漢人。」（註一三）南朝既爲漢文化的正統繼承者，在諸鄰國心目中自然份量較重，所以倭王也輕北而重南。倭使既頻繁來往建康，接觸絢爛的南朝文化，自然帶回不少新知識新技術，如日本發現許多南朝樣式的繪有熱帶動物獅象的神獸鏡便是一例，這對當時的日本當曾發生相當的啓蒙作用。

隋承南北朝之後，中華民族經過了二百年痛苦的磨練，鬱積了充沛的精力，此時忽以大一統的姿態出現東亞舞台，自然使得遠近鄰國受到震動。隋文帝開皇十八年（五九八），派遣大軍三十萬遠征高句麗，倭國聞訊，更加震驚，很快便採取行動，於開皇二十年（六〇〇）派出了第一次遣隋使。由於倭使此次觀摩新興的大隋，獲有深刻的印象，所以聖德太子不久便實現了兩項劃期的政治革新：一爲模仿中國衣冠制度制定冠位（六〇三），以功勳之大小賜以冠位，開人才登庸之路；一爲發佈十七條憲法（六〇四），依據儒家的思想闡明政治要諦，爲日本最古的法典。日本革新既粗有成就，不久又派出第二次遣隋使。隋煬帝大業三年（六〇七），小野妹子率沙門數十人使隋，「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註一四）倭國國書既自稱「日出處」，足證日本當時尚無國號，而他居然以天子自尊，想和隋室分庭抗禮，從當時兩國的國力看來，倭國實在不免夜郎自大，無怪煬帝看了很不高興。可是煬帝看了雖不高興，卻不僅沒有與倭國決絕，反而有遣使報聘之舉，初看似頗費解，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原來煬帝好大喜功，懷抱開國進取的野心，故先後派常駿使赤土，朱寬使流求，李昱通波斯，韋節杜行滿等赴西蕃諸國，今倭國不待遣使而自動來朝，雖其國書無禮，上國自不便與蠻夷斷斷計較，所以煬帝仍於大業四年派裴清等隨倭使東渡報聘，隋書倭國傳云：

『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

由此可知倭國遣使通好的最大目的，即在於「冀聞大國維新之化」，以作建國準繩。裴清歸國時，倭國又派小野妹子護送來朝。據日本書紀卷二十二，此次小野妹子所攜國書，仍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云云，但隋書無記載。衡諸情理，倭國既知煬帝看到第一次國書不悅，應該不會再呈此種國書自討沒趣；因為當時倭國渴望攝取中國文化，實有取悅隋室之必要。小野妹子再度使隋時，帶來留學生和學問僧南淵清安、高向玄理、旻、福因、惠明、大國、惠齊、廣齊等人，他們就是後來大化革新的指導人物。

李唐代隋，政制的整備，軍事的強盛，學藝的發達，都呈現罕有的壯觀。所以亞洲諸鄰國無一不曾受到唐朝的影響，尤以日本所受的影響最為深刻。因為日本當時正在建國途中，大唐帝國恰好是她尋求的建國榜樣。日本於隋末派赴中國留學的學生和僧侶，多到唐朝初年才陸續回國，他們目觀大唐的絢爛文物，無不心醉萬分，回看母國的落後情形，自然觸發迎頭趕上先進國的宏願。唐高祖武德六年（六二二），惠日、福因等自唐回日，奏請日廷召回留學生為國服務，並建議多多派使入唐觀摩學習。日本書紀卷二十二：

『推古三十一年七月……惠日共奏聞曰：「留於唐國學者，皆學以成業，應喚。且其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

此種建議，不久即見諸實施。唐太宗貞觀五年（六三一），日本第一批遣唐使入唐，六年（六三二），僧旻、靈雲等同日，十三年（六三九），惠隱、惠雲同日，十四年（六四〇），高向玄理、南淵清安同日。在這些留唐學生的策動下，不久便實現了劃時代的大化革新。大化革新的領袖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鎌足，都是留唐學生南淵清安的學生，於唐貞觀十九年（六四五）發動政變，推翻以蘇我氏為首的反動勢力，擁立孝德天皇，便開始了革新事業。大化革新是日本新歷史的揭幕，猶如明治維新以西洋化為最高理想一樣，大化革新是以中國化——亦即唐化為最高理想。大化二年（六四六），下詔宣佈新政要點：一、改私地私民為公地公民，二、定畿內京都郡驛之制，三、實施班田法，四、行租庸調法，都是以唐制為藍本。大化革新的長遠目標，是建立唐式的律令國家。天智天皇時，首先參考唐之貞觀令及貞觀格式等編近江令（六六六）。文武天皇時，參考唐之永徽律令及武則天的垂拱格式編大寶令（七〇一）。元正天皇時，又刪改大寶律令參考唐之道僧格等編養老律令（七一八）。律令規定的官制、兵制、田制、稅制、學制，都差不多是唐制的翻版。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日本纔成為一個嶄新的律令國家。武則天天長安元年（七〇一），日本遣唐使粟田真人等入朝，武則天知日人惡「倭」名不雅，改其國號為「日本」。（註一五）史記五帝本紀「東長鳥夷」項下，正義云：

『武后改倭國爲日本國。』

夏本紀「島夷卉服」項下，正義又引括地志云：

『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

按張守節史記正義，撰成於開元二十四年，距離武則天時代甚近，應比後日編撰的新舊唐書所謂倭人自惡其名不雅改稱日本之說，更爲可信。在武則天頒賜新國號後不久，日本又開始奠立了永久性的新國都。新都營建於奈良，完全模仿唐長安京樣式。自元明天皇和銅三年（七一〇）定都奈良後，史稱奈良時代。在奈良朝約八十年間（七一〇——九四〇），歷經七位天皇——元明（女）、元正（女）、聖武、孝謙（女）、淳仁、稱德（女）、光仁，其中四位天皇都是女性。這不是偶然的，正如日本史家田中義成博士所指出，是受唐朝的影響，因為唐有武則天之稱帝，所以日本也多出了女天皇。（註一六）奈良時代，是遣唐使的全盛期。使團組織龐大，團員常多至五六百人，除大使、副使外，包括留學生、學問僧、和各種技術人才。盛唐的文化，就由他們熱狂的輸入日本。因此，奈良時代的儒學、佛教、工藝、美術等，都呈現空前的興隆。唐德宗貞元十年（七九四），日本由奈良遷都平安京，此後史稱平安時代。平安王朝初年，遣唐使仍繼續派送，唐風仍大爲流行。至九世紀末，唐室屢經兵燹，凋敝不堪，甚至『至唐有飢寒難阻之悲』（註一七），日本纔停止遣唐使。此時，日本吸收唐文化已告充實，由於遣唐使的停止，一時隔斷外來的影響，日本得以冷靜的反省，因此，日本文化漸由純粹的模仿大唐，轉而開始表現獨自的風格。

宋太祖開國，時當日本平安王朝中期，自唐末以來兩國國交中斷，兩宋三百年間只有日僧和宋商頻繁來往。宋太宗時，日僧齋然參詣天台山後，至汴京謁宋帝，獻銅器十餘事，並本國職員令，今王年代記各一卷。宋神宗時，日僧成尋訪宋，宋帝授以「善惠大師」法號，待其弟子賴緣回國，宋帝令帶回勅書及賜物。日廷因有「迴賜日本國」字樣，礙於國家體面不便答覆，過了三年，才派僧仲回攜國書及貢物渡宋，結果宋因「貢禮異常」，不受，唯賜仲回以「慕化懷德大師」之號而歸。至南宋孝宗時，日本政局一變，武士得勢，大權歸於平氏。平氏的地盤，原在關西九州一帶，處於對宋貿易最方便的地位。平氏深知獎勵對宋貿易有助於政權的穩定，所以採取積極的親宋政策，先後化費莫大的財力人力，築造兵庫港，開鑿音戶海峽，以便宋船來航。宋商至日，隨時受到熱烈的歡迎。一次平清盛在福原別莊招待宋商，竟請來後白河法皇作陪，當時公卿都認爲此舉有辱國體，表示不滿，甚至有人斥爲惡魔的行爲。（註一八）宋孝宗乾道八年（一一七二），明州刺史送方物至日，上書「賜日本國王物色」，「賜太政大臣物色」，因爲「賜」字有損國家體面，公卿多主張退還，尤以當時碩儒清原賴業主張最力。但平清盛因貪海外貿易的利益，不顧公卿的反對，仍於次年鄭重覆書，並貢獻方物。由此二三例，充分顯示出平氏政權對宋的依存性。白柳秀湖曾分析日本王政與武家政治的歧異，認爲日本皇室如果不顧國體，只想維持權力，也未嘗不可結托中國中央政權，壓制武士的跋扈，但皇室始終不肯出此。武士卻不然。武家政治的確立，固然也是順應時代的趨勢，但其背後有中國中央政權的強力支援，也是不容忽視的。

(註一九)白柳的說法，似乎並非無的放矢。平氏政權僅維持二十年，源氏繼之而興。宋光宗紹興三年(一一九二)，源氏創幕府於鎌倉。日本至此王政結束，開始跨入幕府統治時期。源氏當政，仍繼承平氏的親宋政策。日史相傳第三代將軍源實朝，因夢見自己是宋京能仁寺南山宣律師的化身，曾命宋人陳和卿在由比濱監造大船，準備親訪大宋，不料終因濱邊水淺不宜大船出入，未能達到目的。由此一事，亦可想見源氏一門的慕宋之情。

元朝建立，日本鎌倉幕府實權已歸北條氏之手，史稱北條時代。元世祖既即位，便欲收日本爲藩屬，自至元三年至十年(一三六六——七三)，先後七次遣使招諭日本，都無結果，便決定訴之於武力。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元軍二萬五千及高麗軍八千，戰船九百艘，遠征日本。十月三日，從高麗合浦出發，連克對馬、一岐諸島，接着進軍九州肥前沿海。日本全國大震，北條氏倉皇徵集直系軍十萬馳援。十月十九日，元軍入博多灣。二十日，元軍登陸，以破竹之勢席捲百道原、赤坂、博多等地，日軍因武器和戰法落伍，節節敗退。日本當時史料博多箱崎神社神官撰八幡愚童記卷上，關於兩軍作戰情形有如下的報道：

『蒙古軍……打鼓呐喊……齊射毒箭，中則立斃。又遍排盾、矛以防，遇有來敵則左右迴圍之，協力合擊，無一人得生脫者。……彼甲輕，善乘馬，力強而不惜命，豪勢勇猛，進退自如也。大將據高指揮，兵士進退應鼓聲。將旋軍，則發鐵砲，以火包鐵丸者，擊中爆炸時，火光四散，煙氣爲晦，又其音甚高，致我軍氣奪膽喪，耳聾目眩，惘然不辨東西，因而被殺者衆多。蒙古戰法與我戰法一騎打不同，彼採集團戰法，同時進退，各盡其力。我被殺或虜者無算，可謂無漏者也。』

當天日暮，日軍退守水城，元軍還艦中。不知何故，元軍是夜突然悄悄退去。關於元軍退去的原因，新元史日本傳說是由於大風雨，考之中日韓文獻，頗有問題。(註二〇)元軍既退，幕府乃於九州沿海築壘設防，以防元軍再來。次年，元遣杜世忠等使日，日人殺之於鎌倉。越四年(一二七九)，遣周福等使日，日人又殺之於博多。同年，元滅南宋，宋舊臣牒告日本『宋朝已爲蒙古所滅，恐又危及日本。』(註二一)幕府得訊，更竭力加強防務。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元軍第二次征日，征日軍分南北二路，蒙漢麗軍組成的東路軍四萬人，戰艦九百艘，從高麗合浦出發，宋降卒組成的江南軍十萬人，戰艦三千五百艘，從江南慶元出發，預定於六月十五日前會師一岐島，然後直撲日本城下。東路軍先至博多灣，日本人心恟恟，市無糴米，日皇親至八幡神宮祈禱，乞以身代國難。但江南軍誤期，七月始至，會合東路軍據肥前鷹島。至八月一日夜，颶風大作，戰艦皆破損覆沒，元兵溺死者甚衆，流屍隨潮汐入口，積如邱陵，留在島上者，蒙麗人皆被殺，唯謂新附軍爲唐人，免其一死。元軍兩次征日均歸失敗，實敗於日人堅強的抗元決心。當時蒙古勢燄冲天，日人非不自危，但終能鼓起勇氣，反抗到底，這有兩個原因：其一、由於日本親漢仇胡的傳統思想，所以始終不願與蒙古修好。日人薰沐漢文化，對文化落後的胡人向探輕視態度，如後來懷良親王對明使說：

『吾國雖處扶桑東，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與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註二二)

這充分反映了當時日人的仇胡感情。近代史家栢原昌三亦曾鄭重指出日本「親南疏北」的傳統思想，為考察日元關係必須注意的要件。（註二三）其二、由於日宋關係異常密切，所以日人與宋人同仇。自平安時代以來，日宋貿易日益發達，宋錢盛行全國，宋商不斷來往，使日本上層社會結成一種親宋勢力。同時鎌倉幕府定禪宗為國教，宋禪僧絡繹東渡，他們都受到幕府當局的隆重禮遇，取得幕府當局絕大的信任，如禪僧祖元，受當時執權北條時宗之皈依，曾以「必勝」鼓勵時宗勇猛抗戰，便是著名的史例。宋遺民鄭思肖作「元韃攻日本敗北歌」序文云：

『日本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

可見當時日人是怎樣的同情南宋。由於上述原因，所以日本堅定了抗戰國策；否則，抗戰決心動搖，早已投降，何能等待所謂「神風」來臨。元軍兩次征日，給與日本政治的影響甚大。北條政權受到這兩次打擊，終於一蹶不振，因為兩次防禦戰既化去巨額的戰費，戰後為恐元軍重來，仍不能不繼續投下莫大的財力增強海防，所以北條政權的經濟基礎頓形削弱，反對派勢力逐漸抬頭，不過五十年，鎌倉幕府便告瓦解。羣雄混戰的結果，日本遂進入南北朝時代。以足利氏為中心的武家勢力，組織政府於京都，號北朝，以後醍醐天皇為中心的勤王派，組織政府於吉野，號南朝。南北朝對立凡五十年（一三三六——九二）。

明太祖即帝位，便於同年（一三六八）遣使曉諭日本。次年，又遣使東渡，責令取締倭寇。明使至九州，時九州為南朝勢力範圍，懷良親王設征西府於博多，與北朝足利氏對抗。懷良因明國書措詞強硬，殺明使多人。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又派遣趙秩使日，懷良初疑趙秩為前蒙古使者趙良弼的後裔，非常惱怒，後經解釋明白，懷良才一變態度，遣使入明上表貢方物。次年，明派祖闡、克勤東渡頒賜大統曆，二人先至京都謁足利義滿，然後轉訪征西府，懷良因明使密通北朝，自此對明採取敵視態度。據明史日本傳，丞相胡惟庸謀反，欲藉日本為助，密派林賢赴日本借兵，其王遣僧如瑤率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獻巨燭，中藏火藥刀劍，如瑤至中國時，胡惟庸已敗，其計不行。這裏所謂日本王，即指懷良，惟此事不見於日本國史。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足利義滿終迫南朝屈服，結束分裂的局面，設幕府於京都室町，於是日本復歸於一元的武家統治。義滿深知要鞏固本身的地位，必須獲得明室的支援，因此一面肅清日本對馬、一岐諸島的倭寇，一面遣使入明通好。永樂初年，義滿連年獻俘貢方物，奉大明正朔，接受明室封號，明成祖亦一再派使東渡嘉勉義滿之功，賜義滿金印冕服，封日本阿蘇山為「壽安鎮國之山」。及義滿死，明成祖遣使往弔，賜諡恭獻王。後日的日本史家，對於義滿的受明冊封、奉明正朔，多引為國恥，深表不滿。白柳秀湖說：

『到了足利義滿，竟對明稱臣，受其冊封，恬不為恥。此種關係如加深究，不管歷史表面有無透露，藤原政權的背後也好，平氏的背後也好，源氏的背後也好，北條氏的背後也好，以至足利氏的背後也好，無一不是仰承以中國本土為根據、囊括東亞各國的封建經濟集團的主盟勢力的鼻息，受其支持，靠其援助。』（註二四）

白柳秀湖認為日本歷代的武家政治都仰仗中國的經濟支援，義滿的對明稱臣朝貢也無非反映室町幕府對明經濟的依存性，這是有相當歷史根據的。當時日本適值南北朝紛擾之後，民不聊生，百廢待舉，急需開闢財源。但日本至此時已通行中國錢二三十年，社會只信用中國錢，要取得中國錢以裕國庫，自然只有以朝貢貿易方式換取明室的賜與。永樂二年（一四〇四），明成祖念義滿之忠誠，給勘合百道，定為十年一貢，船限二艘，人限二百。義滿死後，其子義持忽然拒絕稱臣納貢，據辻善之助博士的研究，便是由於永樂條約限制太嚴不能滿足日本要求的原故（註二五）。所以到將軍義教時，明室只得放寬限制，於宣德七年（一四三二）定為十年一貢，人限三百，舟限三艘。但宣德條約雖稍有改善，實仍無法滿足日人的慾望，所以此後中國沿海便不斷有倭寇出現。由於倭寇的頻繁出現，明室防範愈嚴，更不願放寬朝貢的限制。因此，室町幕府的財政愈加拮据，如將軍義政上明景帝表文云：

『銅錢仰之上國，其來久矣。永樂年間，厚賜銅錢，近無恩賚，公庫索然。何由利民，欽請周急！』（註二六）

不過在幕府尚能維持相當統制力進行正常朝貢時，倭寇為害究竟不大，到十五世紀中葉日本進入戰國時代，幕府威信掃地，羣雄互爭朝貢貿易權，於是對明糾紛愈來愈多，終於釀成倭寇之大禍。自嘉靖二年（一五二三），明室因日人滋事罷市舶司，斷絕日本朝貢貿易，致使日本國計民生陷入窘境，於是倭寇與中國沿海走私集團相勾結，騷擾東南各省，神出鬼沒，經明軍四十餘年的輾轉痛剿，才完全蕩平。至明神宗時，豐臣秀吉削平羣雄，統一日本，為了鞏固統治基礎，渴望恢復足利時代的封貢。因此，屢次派使至朝鮮，請朝鮮向明斡旋。據當時朝鮮文獻柳成龍撰「懲毖錄」，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日使玄蘇至朝鮮，曾密語朝鮮大臣金誠一曰：

『中國久絕日本，不通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憤恥，欲起兵端，朝鮮先為奏聞，使貢路得達，則必無事，而日本六十六州之民，亦免兵革之勞矣。』

但朝鮮深知明室惕於記憶猶新的倭寇之禍，不可能准許日本的封貢，所以始終不肯答應日本的要求，因此引起豐臣秀吉之大舉入侵。七年戰爭期間，日本前方將領以大部分時間用於談判，目的就在達成封貢。後來一度成立協定，明室許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結果豐臣秀吉卻拒絕受封，這並非由於什麼豐臣秀吉的忠君愛國觀念（註二七），實由於明室只許封而不許貢日本無利可圖的原故。（註二八）及秀吉死，戰爭才告結束。結果，豐臣家亦隨之沒落。如果沒有對明戰爭，豐臣系實力仍然保存，則以後日本的歷史或將改觀。但豐臣家終因對明戰爭，自食惡果，在秀吉死後第五年（一六〇三），便被德川家康大敗於關原，於是德川氏取代豐臣氏的地位，創幕府於江戶，自此日本進入江戶時代。

滿清入主中原，時日本江戶幕府已實施鎖國政策。此後二百餘年間，只有清商頻繁來往，兩國互不通問，直至同治年間始有正式接觸。不過滿清之盛衰，也曾給與日本相當的影響。自明亡於清，明遺民紛紛東渡避難，這些志士學者，給日本思想界輸入了一股新鮮空氣，如林上珍著「清朝有國論」，何倩著「大明論」，都曾使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註二九），尤其朱舜水的影響

最大，水戶藩主德川光圀受朱舜水的感化，編撰大日本史，高舉尊王大旗，自此一唱百和，終於導致幕末轟轟烈烈的尊王倒幕運動，促成了明治維新。又清道光以降，國勢頹衰，尤其鴉片戰爭之失敗，對整個東亞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在鴉片戰爭後十二年，亦被西方列強打開門戶，被迫締結不平等條約，不過日本由於明治維新的成功，得免陷入滿清同樣悲慘的命運。

二

朝鮮半島毗連中國，自古與中國維持兩位一體的關係。遠在殷周之際，朝鮮便已捲入中國政治的漩渦。史記宋微子世家云：『武王封箕子於朝鮮。』

尚書大傳卷二亦云：

『武王勝殷，……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史記和尚書大傳都是兩千年前的著作，其記載應有相當的根據，所以過去的朝鮮史家，都一致尊箕子為朝鮮史上的正統，並自稱其國為「箕國」、「箕封」。箕子其人其事，雖然無法證實，但殷商亡後，一部分殷遺民逃到原來和殷有不淺姻緣的東北和北韓，從事開墾，創立原始國家，應該是很可能的。（註三〇）到戰國時，燕國為了擴張勢力，經營東北，派秦開進攻朝鮮西方，取地二千餘里，置吏築塞，朝鮮漸弱。後來秦統一六國，派蒙恬築長城到遼東，當時自稱箕子後裔的箕否為朝鮮王，畏懼秦國的軍威，就出而臣服了。箕否死後，其子箕準繼立。不久，秦始皇死，中原大亂。魏志東夷傳云：

『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

秦末中原漢人數萬相攜至朝鮮，對於朝鮮的開化當曾有重大的貢獻。

漢高祖初定天下，封盧綰為燕王，以沮水與朝鮮為界，沮水以北屬燕。不久，燕人盧綰叛秦，逃入匈奴，燕人衛滿（註三一）率千餘人，渡沮水，請求朝鮮王箕準收容。箕子拜衛滿為博士，封之百里，令守西邊。不久，衛滿發動政變，驅逐箕準，自立為王，時為漢惠帝元年（前一九四）。當時漢國基未固，無力經營朝鮮，只要求衛滿遵守兩個條件：一、制止塞外諸族，不使侵擾邊境；二、塞外君長欲朝漢天子，不得留難。衛滿既取得漢室的承認，便乘機擴充勢力，威脅利誘併合隣近部落，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拓地數千里，建立了空前的大王國。當時漢室正需要休養生息，故能彼此相安。到漢武帝時，國力膨脹，要求對外發展，衛氏朝鮮便成為主要目標之一。元封三年（前一〇八），滅朝鮮，設置樂浪、臨屯、真番、玄菟四郡，自此朝鮮半島歸於中國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關於四郡的位置，大體樂浪郡相當於平安南、北、黃海、京畿四道，臨屯郡係採臨屯國的古名，相當於江原道，玄菟郡相當於咸鏡南道，只有真番郡的位置，中韓日學者聚訟紛紛：有主張北方說者，如李朝官書東國文獻備考輿地考

，首倡眞番郡在北方高句麗族居地即鴨綠江上游及鴨綠江支流的佟佳江流域，「朝鮮古史考」著者那珂通世，「漢四郡疆域考」著者白鳥庫吉，以及我國某些學者，均支持此說；也有主張南方說者，如清地理學家楊守敬撰「前漢書地理志圖」，主張眞番郡在樂浪郡的南方，日人稻葉岩吉撰「滿洲發達史」，主張眞番郡在樂浪郡之南忠清道一帶，今西龍撰「眞番郡考」，主張眞番郡在忠清道及全羅北道，韓人李丙燾撰「國史大觀」，主張眞番郡在樂浪郡的南方慈悲嶺以南之地。我們有許多理由，相信眞番郡在南方而不在北方：一、史稱漢武帝因朝鮮阻止眞番朝貢，故與師問罪，如果眞番郡在北方，都於平壤的朝鮮何能阻止；二、漢昭帝時，四郡併爲二郡，廢止臨屯、眞番，另設南部都尉和東部都尉，南部都尉治理漢江以南的地方，應該就是眞番郡的故地；三、朝鮮半島南部土地肥美，爲韓族的根據地，漢室要鞏固統治，實有設郡之必要，而且漢書有「眞番辰國」之名，辰國就是辰韓，足見眞番與辰韓古屬一體；四、鴨綠江上中游交通不便，地瘠民貧，實無設郡的理由，也許後來高句麗能够崛起建國，正是由於漢未置郡得以自由成長之故。如果上述理由能够成立的話，那末在西元前二世紀，朝鮮半島除極南部的全羅道、慶尙道一小部分外，都已入於中國版圖了。西漢末年，國勢漸衰，鴨綠江上中游的高句麗族和半島南部的韓族，開始露出頭角，郡縣統治漸受到威脅。（註三二）王莽時，高句麗不聽命，王莽派兵討伐，斬其王驪。光武中興，因內戰時元氣大傷，對邊疆民族採取放任政策。建武六年（三〇），裁撤東部都尉和南部都尉，南部都尉治理的各縣，改歸樂浪郡直轄，東部都尉治理的嶺東七縣予以放棄，聽由土著自主。於是北方的高句麗族和南方的韓族，都趁這空隙活躍起來。到東漢末年，中原多事，公孫氏割據遼東，朝鮮半島隨着亦落入其勢力範圍。當時高句麗羽毛漸豐，常侵犯玄菟、樂浪郡，南方的韓、東方的濊，也日趨強盛，郡縣官吏無法管制。公孫康爲了挽救危機，乃於樂浪郡之南新設一郡曰帶方，於是半島南部一時復歸穩定。北方的高句麗，因公孫氏掌握遼東、樂浪，無法西進、南進，只得向東發展，結果，舊屬玄菟、臨屯二郡的土地，漸被高句麗所蠶食。公孫氏不能坐視，曾對高句麗兩次大張撻伐，高句麗雖然一時受挫，很快又恢復了元氣。

曹魏代漢，與蜀吳形成三國鼎立之局。曹魏立國北方，以東北爲其勢力範圍，自然不能容許公孫氏長久割據遼東。魏明帝景初二年（二三八），司馬懿大軍進討，斬公孫淵，平遼東。遼東既定，又潛軍浮海，收復樂浪、帶方，於是朝鮮半島歸於魏國所有，帶方郡以南的韓族諸國君主，也都由魏派爲邑君、邑長之類，服屬於魏。可是高句麗昧於新情勢，仍時來犯邊。正始四年（二四四），毋丘儉統率大軍討伐高句麗，攻陷其國都丸都（今安東省輯安縣），國王倉皇逃避。次年，毋丘儉又二次進討，俘殺甚衆，樹紀功碑於丸都而還。高句麗在魏國的壓力下，又不能不雌伏一時了。毋丘儉大破高句麗後二十年，魏亡於晉。晉武帝在位期間（二六五——八九），朝鮮半島大體無事。武帝死後，晉室內閥，自無餘力顧及邊陲，這就給了朝鮮民族發展的絕好機會。北方的高句麗，乘機復興，常侵樂浪、玄菟，南方的百濟，也脫穎而出，常侵帶方，於是晉在半島的領土逐漸縮小。至晉惠帝晚年，內憂外患更形嚴重，朝鮮半島和中原的交通阻斷，高句麗氣餒愈盛，終至僅餘的樂浪郡治，也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晉愍

帝建興元年（三一三），樂浪官民在張統的領導下，退出朝鮮，投奔遼西的慕容廆，這是晉室東遷前四年的事。通鑑晉紀卷十：『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即美川王）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爲之置樂浪郡。』

自漢武帝在朝鮮置郡縣，至西晉末年迫於內憂外患撤出朝鮮，中國郡縣統治維持約四百年。誠如韓國史家李丙憲所說，朝鮮半島中國郡縣的存在，對其周圍的土著社會，雖曾成爲一種刺激劑與興奮劑，但同時亦曾爲後者領土發展上的最大障礙。（註三三）中國郡縣統治既告結束，高句麗、百濟和新羅，大事活躍，從此朝鮮半島成爲三國鼎立的局面。

自五胡之亂，晉室東遷，中國出現長期混亂的局面。南北朝三百年間，朝鮮半島由於沒有外力的干涉，得以自由發展，三國逐漸強大起來。三國之中，只有高句麗與中國接壤，因此，爲了爭奪遼東領土，曾與前燕發生衝突。故國原王（釗）十二年（三四二），慕容皝大舉進攻，陷國都，王倉皇逃遁，王陵被掘，母后妻子及男女五萬餘口被擄，宮殿府庫付之一炬。高句麗不得已卑辭求和，自此向前燕稱臣入貢。後來前燕爲前秦所滅，又轉而臣服前秦。至廣開土王（談德）時（三四二—四一二），高句麗始進入全盛時代。王曾屢破後燕，將屢起爭執之遼東完全收爲己有，又屢征百濟，奪取帶方故地，一生拓地甚廣，實無愧稱爲廣開土王。王死，其子長壽王（璉）繼位，在位七十九年。王開始對南北朝採取兩面外交政策：對北朝，自王之二十四年（四三六）始通北魏，對南朝，自王之元年（四一三）始通東晉，王之八年（四二〇），接受劉宋冊封，其後繼諸王，都向南北朝分別朝貢。高句麗所以採取兩面外交政策，無非欲穩住中國，俾便專力對付百濟。百濟當近肖古王時（三四六—七四），南併馬韓餘地，北收帶方的大部領域，爲其全盛時代。至五世紀，屢被高句麗挫敗，失地日多，至蓋鹵王（餘慶）末年（四七五），國都被高句麗攻陷，南遷熊津，處勢益危。百濟爲了對抗高句麗的壓力，除就近通倭向其殷勤貢獻外，也對南北朝採取兩面外交政策：對北朝，自蓋鹵王十八年（四七二）開始奉表朝貢北魏，至北齊、北周相繼入貢；對南朝，通使更早於北朝，自腆支王十三年（四一七）接受東晉冊封，以後歷宋齊梁陳貢獻不絕。至於新羅，因僻處半島東南隅，比較閉塞，興起較晚，至六世紀，纔大露头角。眞興王十二年（五五一），擊敗高句麗，佔據漢江流域，纔打開了面向大陸之窗，故新羅通中國最晚。

隋文帝滅陳，結束三百年南北對立之局，一個嶄新面目的大帝國突然出現，自使朝鮮半島感到震驚，特別是高句麗接壤中國，更加不安。不過高句麗此時已是一個擁有廣土衆民的大王國，雖然繼續對隋朝貢，却不甘心輕易就範，一面治兵積穀，作抗戰的準備，一面誘納漢人亡命，密探大隋消息。隋開皇十八年（五九八），嬰陽王（元）爲謀先發制人，竟率靺鞨部衆侵入遼西。隋文帝大怒，即命漢王諒將兵三十萬進討，但出臨渝關，因遇到水潦並發生疫癘，中途退兵，嬰陽王亦遣使謝罪，一場風波才算平息。隋煬帝繼位，好大喜功，徵嬰陽王入朝，不至，適百濟新羅不堪高句麗的侵擾求援於隋，乃立定征服高句麗的決心。大業八年（六一二），帝親征高句麗，大軍渡遼水，圍攻遼東城久不能下，令宇文述領軍三十萬渡鴨綠江南征，被敵將乙支文德設計

誘藏於薩水。三國史記卷二十高句麗本紀第八：

『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驕勝，又迫羣議，於是遂進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王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述等爲方陣而行，我軍四面抄襲，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至薩水，軍半濟，我軍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九軍到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

次年，煬帝再度親征，傾全力攻遼東城，高句麗軍堅守不下，旋因聞楊玄感叛變，倉皇退兵。煬帝既遭二次失敗，仍不死心。大業十年（六一四），三次進討，軍容已遠不如前，士氣低落，好在高句麗也已困疲，所以隋軍攻破卑沙城後，嬰陽王即遣使乞降，煬帝亦乘機罷手。不過四年，煬帝死，隋朝也亡了。

李唐代隋，高句麗莫離支泉蓋蘇文擅專國政，聯合百濟侵略新羅，新羅遣使告急，唐太宗派人調解無效，便決定對高句麗用兵。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太宗車駕親征，連陷諸城，遂圍安市。安市城主忠勇善戰，圍攻久不能克，唐軍不敢捨城前進，終於師老城下，等到草枯水凍，食糧將盡，不得已退兵。安市城主姓名，正史不詳，朝鮮野史傳爲姓楊名遇春，並傳唐太宗曾被射傷一目。朴趾源熱河日記卷一：

『世傳安市城主楊萬春射帝中目。……三淵（金昌翁）送其弟入燕詩曰：「千秋大胆楊遇春，箭射虬髯落眸子。」……當出於吾東流傳之舊。……唐書及司馬通鑑皆不見錄，則疑其爲中國諱之。』

安市城主曾否射傷唐太宗，雖難下斷語，但唐太宗動天下之兵，竟失意於此區區小城，當時高句麗人抗戰精神的旺盛，可以想見。越三年，唐太宗又命李世勣領兵三千進討，目的只在困擾敵人，戰爭規模不大，戰果也不足道。唐高宗繼位，鑒於過去痛苦的經驗，認爲有改變戰略的必要，決定先平百濟，斷絕高句麗的後援，使她陷於孤立，然後伺機加以解決。唐顯慶五年（六六〇），唐與新羅聯軍進攻百濟，閃電攻陷其國都泗泚，國王義慈和太子隆等投降。但百濟王族福信和僧道濟等收集殘餘，據周留城，另立王子豐璋，並遣使赴日本求援。唐龍朔三年（六六三），日本大軍馳援百濟，在白江口與唐軍發生遭遇戰，結果，日軍大敗。日本書記卷二十七：

『戊申，日本船師與大唐船師合戰，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堅陣以守。己酉，日本諸將與百濟王進擊大唐堅陣，大唐自左右來攻，須臾，官軍敗績，赴水溺死者衆，艫舳不得迴旋。……』

國史記載與日史略異。（註三四）日本既敗，百濟的戰鬥力隨之瓦解，百濟遂亡。唐平百濟後，經過三年的休養，高句麗忽然發生內訌，唐室便決定利用機會，一舉解決高句麗。原來莫離支泉蓋蘇文死後，長子泉男生繼立，一天男生離城出巡時，其弟男建

、男產忽然舉起叛旗，男建自爲莫離支，男生不得已遂向唐投降。唐以男生爲嚮導，大舉進攻，並約新羅出兵，終於攻陷屢攻不拔的平壤城。高句麗這個與隋唐盛世武力周旋了六七十年的大王國終於滅亡，時爲唐總章元年（六六八）。於是唐以高句麗百濟故地收入中國版圖，在百濟置五都督府，高句麗置九都督府，而設安東都護府於平壤，派薛仁貴爲安東都護。此時，朝鮮半島只留下唯一的獨立國新羅。當初唐出兵的動機，本是爲了援助新羅，所以在戰事進行中，新羅亦能精誠無間的與唐合作，可是唐化莫大人力物力獲致的輝煌戰果，最後却被新羅所獨吞。原來朝鮮半島已有三百餘年的獨立歷史，民族意識逐漸覺醒，百濟高句麗與新羅雖爲世仇，二國既亡，其遺民却將民族復興的希望轉而寄托於新羅。新羅領導者默察大勢，認爲大有可爲，所以平壤陷落後，即一反以前與唐合作的態度，擅佔百濟故地，並煽動高句麗遺民武裝反唐。不久，便與唐軍發生正面衝突，唐軍屢戰屢敗，勢力日形萎縮。唐儀鳳二年（六七七），安東都護府亦被迫內遷遼東。於是西起大同江、東至元山灣的半島細腰部以南之地，完全成爲新羅的勢力圈。一面新羅利用巧妙的外交，討取唐帝的歡心。至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七三五），終於正式宣佈大同江以南之地賜與新羅。這樣，新羅便完成了朝鮮半島空前的統一大業。如果不是唐朝全力的干涉，三國鼎立之局必然仍將延長，最後完成統一的，也許是高句麗，而非新羅。

殘唐五代是中國史上的一大紛爭時期，任何一代都無餘力顧到海外，因此，朝鮮半島一時完全免於來自中國的影響。於是原受唐室支援的新羅政權逐漸削弱，終於重演新的三國鼎立之局，即除新羅苟延殘喘外，又出現兩個新政權，一爲興起於高句麗故地的弓裔政權，一爲興起於百濟故地的甄萱政權。新的三國鼎立約持續四十年，最後由弓裔的部將王建統一朝鮮半島，創立了高麗王朝。王建之所以能順利完成統一，正如許多史家所指出，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沒有中國的干涉。（註三五）高麗立國於後梁貞明四年（九一八），歷唐晉漢周朝貢不絕。

宋室興起，高麗於建隆三年（九六二）開始遣使朝貢，自此受宋冊封，用宋年號。高麗爲了討取宋帝的歡心，並利於宋室的賜與，頻繁派遣貢使，而宋室爲了懷柔遠人，亦對高麗貢使優禮有加。文獻通考三二五卷四裔考二：

『高麗之臣事中朝（宋）也，蓋欲慕華風而利歲賜耳。中朝之招來高麗也，蓋欲柔遠人，以飾太平耳。』

由於高麗貢使來往頻繁，增加了宋室國庫的負擔，所以禮部尚書蘇軾說：『高麗入貢無絲毫利。』御史胡舜陟說：『高麗糜餽國家五十年。』（註三六）可是和平的文化關係，却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高麗對宋和對遼金不同，是一種衷心的悅服。（註三七）不幸宋室積弱不振，疏於邊防，結果先有遼之勃興，後有金之崛起。宋室既先後爲遼金所苦，備受蹂躪，高麗毗鄰東北，當然也不免遭遇同樣的命運。自宋討遼敗於岐溝（九八六），遼之勢燄日盛，一面對宋步步進迫，一面以銳鋒指向高麗。宋淳化四年（九九三），遼大軍侵入高麗，高麗派徐熙往敵營談判，結果遼許和退兵，自此高麗對遼朝貢，奉遼正朔。至宋遼澶淵之盟後七年（一〇一一），遼又藉口大舉侵入，攻陷開京，焚掠一空，以後數年間遼軍又四次侵入，高麗受害甚大。至遼開泰九年（一〇

二〇），高麗不得已始一意事遼，對遼稱藩納貢，停止用宋年號，唯仍祕密朝貢於宋。至十二世紀初，女真興起，首先與高麗發生衝突，結果高麗獲勝，在佔領地築九城（一一〇八），旋以女真入貢爲條件，撤出九城還其地與女真。宋徽宗政和五年（一一一五），女真建國號曰金，大敗遼軍，宋欲連金攻遼。政和六年，高麗遣李資諒使宋，宋徽宗諭高麗斡旋宋金連盟，高麗使者認爲危險，曾力加勸阻。東國通鑑卷二十高麗睿宗十二年條云：

『李資諒還自宋。資諒至汴京，帝御睿謀殿，盡召一行賜宴。……及還，帝密諭曰：「聞汝國與女真接壤，後歲來朝，盍招引數人偕來。」資諒奏曰：「女真人面獸心，夷獠中最爲貪醜，不可通。」』

可惜宋徽宗不納高麗使者之言，仍於次年遣使通金，相約夾攻遼國，終於引狼入室，自食惡果。在金兵攻陷汴京的同年（一一二六），高麗開始向金稱藩納貢，受金冊封。宋南渡後，高麗改用金的年號，唯仍由海道通宋。宋光宗以後，高麗與宋的關係始告斷絕。至金哀宗正大元年（一二二四），金爲蒙古所迫，國命垂危，高麗纔停用金的年號。

蒙古興起，高麗又陷入新的厄運。自成吉思汗助高麗平定境內契丹之亂，高麗開始對蒙古臣服納貢（一二二八），後因蒙古徵貢使遇害，國交中斷。及元太宗窩闊台即位，決定與師問罪。高麗高宗十八年（一二三一），蒙古大將撒禮塔領兵侵入，連陷高麗要地，一路屠殺官民，『盡燒人戶，雞犬一空』（註三八），高麗不得已投降，蒙古便在各地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督行政，引軍而還。高麗本欲從此相安，無奈達魯花赤跋扈橫暴，壓迫無所不至，所以不久關係復告破裂。高麗看破蒙古軍的弱點，不利水戰，乃遷都江華島，作長期抗戰的準備。窩闊台聞訊，又派撒禮塔二次進討（一二三二）。及撒禮塔戰死，復命唐古統兵進討。三年之間，蒙古軍連陷慈、朔、龜、黃、信、安諸州，更南取牙山、竹山，略全州，並侵入慶州焚黃龍寺塔，八道被蒙古鐵蹄蹂躪殆遍。高麗請降，蒙古命高麗國王親朝，遂撤兵，但其後高麗並未履行條件。至元憲宗蒙哥時，復促高麗國王親朝，不聽，又發動多次大規模的進攻，所過焚殺擄掠，盡成廢墟，尤以車羅大的部隊殺掠最慘。高麗史卷二十四高宗世家四十一年（一二五四）條：

『是歲蒙兵所虜，男女無慮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戮者不可勝計，所經州郡，皆爲煨燼，自有蒙兵之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當時蒙古的目的，是要強迫高麗還都和國王親朝，以便全面控制，高麗雖一再哀求撤兵，却不敢接受此種條件。兵連禍結，年復一年。高麗高宗四十五年（一二五八），蒙古軍又從女真地方侵入高麗東北境內，設雙城總管府於和州，以韓人趙暉爲總管。至此，高麗國土已損失過半。次年，爲了表示歸順誠意，送太子僊入質。及元世祖即位（一二六〇），鑒於高麗對日本和南宋的戰略地位，欲加以利用，始一變高壓政策，而爲懷柔政策。會高麗國王死，即護送太子僊回國即位，是爲高麗元宗。自此高麗一心歸命，效忠元室。後來元世祖下嫁皇女於世子昀，世子嗣立（一二七五），是爲忠烈王。此後高麗國王繼尙蒙古公主，二國成爲

甥舅之國。元室操縱高麗國政，一如處理家務，高麗名為獨立，實則無異屬領。忠烈王（ㄏㄨㄟ）、忠宣王（ㄓㄨㄢ）、忠肅王（ㄓㄨ）、忠惠王（ㄓㄨㄟ），都曾因元室之喜怒不常，忽立忽廢，其中忠宣王曾被流於吐蕃，忠惠王曾被三立三廢，終遭貶死。當時高麗的貴族爲了保全祿位，都競與蒙古通婚，風俗習慣也蒙古化，國王貴族都採用蒙古名。至恭愍王（ㄅㄩㄣ）時，元室勢衰，始暗圖擺脫元的控制。恭愍王八年（一三五九），劉福通別部毛居敬率衆竄入高麗，陷西京、開京，旋被擊潰。恭愍王十七年（一三六八），明軍克大都，元順帝北逃，始停用元的年號。但高麗宮廷仍爲親元派所盤據，直至高麗朝末年。

明太祖即位，即遣使曉諭高麗，賜璽書。恭愍王十八年（一三六九），派謝恩使赴金陵表賀請封，帝賜金印誥文封爲高麗國王。次年，高麗改用明洪武年號。越四年，恭愍王遇弒，李仁任擁立幼主辛禔，把持國政，親元派得勢，轉採親元疏明政策，並殺明使以防洩漏消息於明。高麗史卷一百二十六李仁任傳：

『或謂仁任曰：自古國君見弒，爲宰相者先受其罪，帝若聞先王之故與師問罪，公必不免，莫若與元和親。仁任然之。及帝使蔡斌等還，仁任遣贊成事安師琦陽言餞行，密諭金義中路殺斌以滅口，義遂殺斌奔北元。由是人心疑懼，未敢通使朝廷（明）。』

高麗既殺明使，兩國關係便陷低潮。辛禔三年（一三七七），高麗遣使通北元，復用北元宣光年號。但當時明的國運有如旭日升天之勢，而元却在土崩瓦解的過程中，所以高麗君臣也漸悟背明失計，次年又廢北元年號，復用明年號。高麗深恐明帝譴責，屢次派使入明朝責，並辯解無異心，可是明室因高麗反覆，終不見諒。辛禔十四年（一三八八），親元派爲了對明報復，乃謀進攻遼東。李成桂洞察大勢，決心利用大明新興勢力實現其野心，便在奉命進攻遼東的中途，突然回軍開京，逮捕親元反明的大臣，流放辛禔，於是親元派失勢。不久，王氏高麗就被李氏朝鮮取而代之了。李成桂既以親明爲號召取得政權，即位後便遣使赴明求封，請就「朝鮮」、「和寧」二名選擇其一爲國號。和寧是李成桂的發祥地，朝鮮則有深長的歷史意義，所以明太祖決定命名爲朝鮮，詔曰：

『東夷之號，唯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註三九）

當時李朝君臣對朝鮮國號的頒賜，都表示很興奮，如鄭道傳上表說：

『蓋以武王命箕子者命殿下，名正而言順，……今既襲朝鮮之美號，則箕子之善政，亦當講求。』（註四〇）

自此李朝遵奉事大主義，對明始終一片忠誠。明室對朝鮮的態度，也非常寬大，如明太祖諭禮臣曰：『高麗屢請約束……故索歲貢以試其誠僞，非以此爲富也。』明宣宗諭朝鮮國王曰：『金玉之器，非爾國所產，宜止之，土物效誠而已。』（註四一）表示明與元不同，非以索歲貢爲奪取手段。而最使朝鮮感恩不盡的，是明神宗萬曆年間爲朝鮮抵抗日本之侵略，歷時七年，終使朝鮮免於亡國之厄。朝鮮肅宗實錄卷一乙卯元年正月己巳條云：

『龍蛇島夷之亂，萬曆皇帝爲之動天下兵，捐大府數百萬金，文武將士不辭隕軀捐身於鋒鏑之下，卒以拔之水火之中，措諸衽席之上，其興滅扶顛之德，與天無極！……』

所以明室雖亡，朝鮮仍追慕不已，如李肅宗於禁苑築大報壇，祀明太祖、神宗、毅宗三帝，李正祖敕撰「尊周彙編」，以表尊明之誠，甚至降於滿清後，朝鮮對國內仍用明崇禎年號達百餘年之久。

滿人興起於東北，韓人素視之爲「野人」「虜夷」加以輕蔑。自滿人與明室爲敵，朝鮮因效忠明室，更對滿人充滿敵意。李朝光海君八年（一六二六），努爾哈赤建國號後金。越四年，大敗明軍於薩爾滸山。明徵兵於朝鮮，光海君派姜宏立率兵二萬馳援，結果不幸戰敗。努爾哈赤釋放朝鮮戰俘，致書光海君云：

『昔爾國遭倭難，明以兵救爾，故爾國亦以兵助明，勢不得已，非與我有怨也。今所擒將吏，以王之故，悉釋還國。去就之機，王其審所擇焉。』（註四二）

努爾哈赤雖示撫慰，朝鮮的敵意却不稍減，暗助退守皮島的明軍，屢襲後金沿海城寨。李仁祖五年（一六二七），皇太極派大軍入侵，下平壤，迫京城，仁祖逃江華島。朝鮮派使求和，結果約爲兄弟之國，以王弟爲質，春秋輸歲幣，戰事纔告結束。仁祖十四年（一六三六），皇太極稱帝，改國號曰清，朝鮮派使朝賀，拒行三拜九叩禮，令送質子，復置之不理。清帝大怒，親率大軍十萬進討。清軍勢如破竹，不到兩個月，下京城，陷江華，俘王妃王子。朝鮮不得已作城下之盟，約定：朝鮮對清永事君臣之禮；去明年號，奉大清國正朔；萬壽節、冬至、元旦、及慶弔等事俱行貢獻禮等。自此朝鮮正式成爲清之藩屬。這是大明亡國前七年的事。其實朝鮮所以對清採取頑固的敵視態度，只是爲了感念大明恩德，並非本身與清有何不解之仇，正如李仁祖上清帝書所說：

『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詩書，不事兵革，以弱服強，以小事大，乃理之常，豈敢與大國相較哉。徒以世受皇明厚恩，名分素定，曾在壬辰之難，小邦朝夕且亡，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拯濟生靈於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銘鏤心骨，寧獲過於大國，不忍負皇明，此無他，其樹恩厚而入人深也。』（註四三）

但滿清隨着統治的鞏固，漸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者，由於文化與經濟的交流，兩國的關係一天天密切，因此，朝鮮事清也漸如事明一樣的恭順忠誠。及清室衰弱，屢爲列強戰敗，朝鮮失去屏障，亦被迫開放門戶，成爲列強的角逐場。最後，清室也和明室一樣，爲了保護朝鮮，不惜賭國運與日本一戰，結果不幸失敗。在朝鮮被日本合併的次年，清朝也亡了。

雒將，蜀王子因稱爲安陽王。」

安陽王在位五十年，自周赧王五十八年（前二五七）滅雄王，至秦二世二年（前二〇八）爲趙佗所滅。

越南的信史，始於秦代。秦始皇爲了「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註四七），命屠睢統兵五十萬南征，由於越人抗戰甚力，秦軍遭受重大損失，於是再發逋亡人、贅婿、賈人，二次進討，終予底定。始皇三十三年（前二一四），設置南海、桂林、象郡。南海、桂林二郡在今廣東廣西境內，象郡則在今越南境內。始皇置象郡，爲中國在越南設治之始。不過也有學者，主張象郡不在越南境內的。如法人馬思伯樂撰「秦漢象郡考」（註四八），以象郡位置於廣西貴州二省境內，日人佐伯義明撰「關於秦代之象郡」（註四九），以象郡位置於廣西省賓陽縣爲中心之地，但他們依據的史料，顯然都有問題。據鄂廬梭的嚴密考證，象郡確已包括今越南大部分在內（註五〇）。秦始皇死後，羣雄蜂起，中原大亂，時任置爲南海郡尉，趙佗爲南海龍川令。任置素有野心，謀據地自雄，會病危，乃以遺業付趙佗，命行南海尉事。秦二世二年（前二〇八），任置死，趙佗即封鎖北通中原之道，聚兵自守，誅除異己，代以自己的黨羽。次年，秦亡，趙佗自立爲南越武王。趙佗既鞏固內部，便進而謀併合桂林、象郡。桂林似乎很簡單的被併合了，象郡却不然。相傳安陽王有神弩，勢不可當，趙佗無法取勝，後其子趙始詐與安陽王女媚珠相愛，伺機破壞了神弩，才擊敗安陽王。雖然語近怪誕，究反映趙佗併合象郡曾經過艱苦的戰鬥。趙佗既滅安陽王，越南遂歸入包有兩廣的南越國。

漢高祖統一中國，新經戰亂，生民勞苦，對南越採取綏靖政策。高祖十一年（前一九六），派陸賈出使南越，立趙佗爲南越王。至呂后執政時，禁止南越關市鐵器，趙佗不滿，自進號南越武帝，表示與漢對抗。漢文帝時，陸賈二次出使南越，加以安撫，趙佗再去帝號稱臣入貢。趙佗在位七十年，死於漢武帝建元四年（前一三七），其孫趙胡繼立，對漢極其恭順，曾遣太子趙嬰齊入長安宿衛，娶邯鄲繆氏女，生趙興。後趙興爲南越王，繆氏爲太后，勸其子請求內屬如漢國內的諸侯，越人丞相呂嘉不滿，攻殺王及太后，便引起漢軍的南征。漢武帝元鼎五年（前一一二），路博德楊僕等率領大軍十萬，分水陸四路進攻，次年，會師番禺，俘呂嘉。接着，路博德復移軍平定交趾。交州外域志（註五一）云：

「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後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路將軍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三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爲交趾九真太守，諸雒將主民如故。」

漢平南越後，分其地爲九郡，其在今越南境內者，爲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趾郡轄十縣，九真郡轄七縣，日南郡轄五縣，自此越南爲中國郡縣達一千餘年之久。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四〇），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姊妹，因交趾太守蘇定爲政貪暴，起兵反抗，一時九真、日南、合浦的越人紛起響應，攻略六十五城，徵側自立爲王。次年，光武帝命馬援統兵進討，屢戰屢勝。建武十九年（四三），斬徵側徵貳。馬援續率大軍向南推進，平九真、日南，直至日南南界，立兩銅柱以表漢界。據大南一統志卷一，日

南郡南界在今之大嶺，此嶺已離慶和不遠，其入海之岬就是伐勒拉岬（Cap Varella）。（註五二）由於大漢國界的向南伸展，日南便成為當時中國極南的門戶，所以史書記載當時許多海外遠國，都是來自「日南徼外」。

東漢末年，中原紛擾，交趾太守士燮，保境安民，禮賢下士，中原人士多往依附，遂成一方霸主，越史稱之為「士王」。當時中原羣雄，都想染指利盡南海的交州，而士燮的應付手腕，也極其靈活。當初曹操爲了牽制荊州的劉表，竭力籠絡士燮，以士燮爲綏南中郎將，仍領交趾太守。士燮爲了鞏固地位，也對曹操表示服從，遣使入京奉貢，晉授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及曹操敗於赤壁之戰，南進計劃遭受挫折，整個形勢爲之一變，江東孫權乘機謀取交州。建安十五年（二一〇），孫權以步騭爲交州刺史，次年到任，士燮率諸弟奉承節度，孫權任爲左將軍，自此交州服屬於吳。士燮對於孫權的恭順，尤過於其對曹操。吳蜀失和，士燮誘使益州豪姓雍闓附吳，因功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吳黃武五年（二二六），士燮死，孫權爲了加強統治，接受呂岱的建議，分合浦以北四郡爲廣州，交趾以南三郡爲交州。派呂岱爲廣州刺史，戴良爲交州刺史，用調虎離山之計，調士燮之子士徽爲九真太守。士徽兄弟不服命，呂岱率兵進討，誅士徽兄弟，交州遂直屬於吳國。吳永安六年（二六三），魏滅蜀，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資叛吳，九真日南應之，三郡同附於魏。魏亡晉興，交州歸晉。晉武帝泰始四年（二六八），吳主孫皓命將進攻交趾，戰不利，又遣陶璜等往討，終於泰始七年（二七一）收復交趾，隨着九真日南亦再屬於吳。至晉太康元年（二八〇），吳爲晉滅，陶璜始以交州歸附於晉。

自五胡亂起，中原板蕩，無一片乾淨土，交州亦隨着變亂迭起。主要的亂源，便是林邑。原來日南郡所屬五縣中最南的象林縣，有占人（Cham）於東漢末年建立了一個國家，自稱占婆（Champa），我國史名之曰林邑，晉自偏安江左，國力萎縮，無暇他顧，林邑逐漸強大。穆帝永和三年（三四七），林邑王范文攻陷日南，殺太守夏侯覽，據日南三年。自范文經范佛、范胡達祖孫三世約百年間，林邑不斷的侵寇日南、九德諸郡，殺蕩甚多，交州遂致虛弱。劉宋時，林邑仍時叛時服。元嘉二十三年（四四六），交州刺史檀和之奉命進討，連戰皆捷，「其王陽邁舉國夜奔，竄山藪，據其城邑，收寶巨億。」（註五三）自此林邑衰弱，終南朝之世未嘗北犯。蕭梁時，交趾又發生李賁之亂。李賁的先世爲中原人，西漢末年南遷，七世居交趾，因仕途失意，心懷怨憤，會交州刺史蕭諮以刻暴失衆心，便連結數州豪傑起兵，佔據龍編。大同十年（五四四），李賁自稱南越帝，國號萬春。翌年，梁以楊驃爲交州刺史，陳霸先爲司馬，任前鋒，鼓行疾進，李賁敗死。陳霸先就是後來陳朝的開國之君。會梁有侯景之亂，陳霸先還軍廣州，李賁的餘黨死灰復燃，趙光復再據龍編，稱趙越王，李賁之兄李天寶居夷獠中，稱桃郎王。李天寶死後，族人李佛子統率其衆。陳宣帝大建三年（五七一），李佛子逐趙越王，自立爲帝，都峯州。越史以李賁爲前李南帝，李佛子爲後李南帝。

隋文帝滅陳，南北統一，唯交州僻處南陲，李佛子仍割據稱帝。仁壽二年（六〇二），以劉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督，統軍南征

，李佛子拒之於都隆山，劉方令人諭以禍福，李佛子懼而投降，交州遂屬於隋。劉方既定交州，又奉命向南推進，收併今日中圻南部的林邑。煬帝大業元年（六〇五），劉方分軍二路，令寧長真將步騎兵出越裳，自將舟師出比景，水陸並進，大破林邑，過馬援銅柱南行八日，入林邑國都，其王范梵志棄城入海。隋定林邑後，分其地爲三州：一爲蕩州，尋改爲比景郡；二爲農州，尋改爲海陰郡；三爲冲州，尋改爲林邑郡，每郡各轄四縣。及隋軍撤退，范梵志聚餘衆別建國邑，遣使謝罪，朝貢不絕。

李唐代隋，交州隨着歸順，林邑亦屢次遣使貢獻。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置交州總管府。太宗時，劃全國爲十道，交州屬嶺南道。高宗調露元年（六七九），改交州都督府爲安南都護府，安南之名自此始。安南都護府轄交、峯、陸、長、愛、驩、福祿、武峨、武安、湯、芝、演十二州。（註五四）在初唐盛唐百餘年間，大唐國運興隆，安南亦分享其繁榮，當時交趾爲中國主要貿易港口之一，富實與廣州並稱。舊唐書地理志：

『交州都護制諸蠻，其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自漢武以來，朝貢皆必由交趾之道。』

最末一句，充分說明了交趾在南海貿易中的重要地位。唐德宗時，嶺南節度使因「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曾建議於安南置市舶（註五五），事雖未成，究透露了當時安南的繁榮。（註五六）但九世紀初，大唐帝國進入衰運，安南又告多事。德宗貞元十八年（八〇三），南方的環王（林邑改名），北陷驩州、愛州，勢燄甚盛。不久，張舟爲安南都護，築城設防，嚴陣以待。憲宗元和四年（八〇九），環王來侵，張舟大破之，俘其驩州愛州都統及王子，斬首三萬級，環王南遁。南方的強敵既退，北方的強敵又起。北方的南詔，據有雲南一帶，西聯吐蕃，對唐時服時叛。唐宣宗時，南詔王酋龍，野心勃勃，覬覦安南，適安南都護李琢爲政貪苛，越人怨之，引導南詔入侵。懿宗咸通元年（八六〇），南詔攻陷都護府城，次年，爲都護李鄆擊退。咸通四年（八六三），南詔再陷都護府城，以段酋遷爲安南節度使，佔領安南三年，後爲高駢收復。南詔先後殺擄不下十五萬人之多。唐僖宗時，黃巢作亂，乾符五六年間（八七八、八七九），連陷廣州交州，欲據爲根基，上表請授以安南都護嶺南節度使，唐室不許。適疾疫大作，黃巢北去。由於唐末內憂外患的交迫，中國的統治基礎大爲削弱，不久，安南便進入了自主時代。

五代時，全國陷於混亂狀態，當時安南爲中國的一環，自然不能例外。後梁篡唐時，劉隱據廣州，曲瀨據交州，梁拜劉隱爲安南都護。劉隱死，弟劉龔繼之，梁貞明三年（九一七），自立爲帝，國號大越，旋改爲漢，是即十國之一的南漢。不久，南漢以武力併交州，滅曲氏。曲氏舊將楊延藝（註五七）不服，逐走南漢所置交州刺史，自稱節度使，旋爲部將皎公羨所殺。楊延藝之婿吳權，起兵攻公羨，公羨求援於南漢。結果，吳權大破南漢軍於白藤江，殺公羨。後晉天福四年（九三九），吳權自立爲王。這是安南人脫離中國獨立建國之始。

宋朝約三百年間，安南歷經丁、黎、李、陳四王朝。宋太祖建國之初，適吳權之子昌文在位。乾德元年（九六三），吳昌文

死，羣雄蜂起，各據一方，號「十二使君」。驪州刺史丁部領，東征西討，平定十二使君之亂，被推爲萬勝王，開寶元年（九六八），自號大勝明皇帝，建國曰大瞿越。越三年，宋平南漢。丁部領震於聲威，遣長子丁璉入貢。宋因中國尚未統一，安南僻處一隅，自主已久，故持容忍態度，開寶八年（九七五），封丁部領爲交趾郡王。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丁部領與長子璉同遇弒，幼子璿繼位。十道將軍黎桓，專權樹黨，幽禁幼主，號攝政王。宋太宗聞變，決定興師問罪。太平興國五年（九八〇），宋軍大舉南征，黎桓發兵抵禦，模仿陳橋兵變，篡位自立。及宋軍入越，黎桓大破之，旋復遣使入貢求封，於是宋室改採羈縻政策。初授黎桓靜海軍節度使（九八六），旋封交趾郡王（九九三），再進爲南平王（九九三）。黎桓死，子龍鉞即位，僅三日，其弟龍鋌弒之自立，宋眞宗封爲交趾郡王，賜名至忠。龍鋌在位四年，爲殿前指揮使李公蘊所廢，黎朝遂亡（一〇〇九）。李公蘊傳爲閩人（註五八），即位後，遷都昇龍，自稱留後，遣使入宋求封，宋雖惡其篡逆，仍援黎桓故事，封李公蘊爲交趾郡王。天禧元年（一〇一七），進爲南平王。三傳至李日尊，改國號爲大越，獎勵文教，治績斐然。李日尊死，子乾德嗣位，國勢益盛。時王安石執政，有意經略交趾。宋神宗熙寧八年（一〇七五），李乾德爲了先發制人起見，遣軍三道北犯，連陷欽州、廉州、邕州。次年，宋派郭達進討，逐退越軍，進至富良江，斬乾德之子洪眞。乾德請和，繼續入貢。六傳至李天祚，時宋已南渡，國勢不振，宋孝宗爲了羈縻起見，封李天祚爲安南國王。自此安南正式稱「國」。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一五三云：

『案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

安南獨立已二百餘年，至此始得中國之正式承認。八傳至李昊昂，無子，女昭聖即位，年僅七歲，不數月，便讓位於其夫陳日煚，時爲宋理宗寶慶元年（一二二五）。於是李朝閉幕，陳朝成立。陳朝的開國之君陳日煚，傳爲福州長樂邑人（註五九），即位後遣使貢獻，宋理宗封爲安南國王。淳佑二年（一二四二），詔安南國王陳日煚元賜「効忠順化保節功臣」增「守義」二字。至寶佑元年（一二五三），蒙古兵滅大理，據雲南。越四年（一二五七），進攻安南，陷其國都。安南自此不斷受着蒙古的威脅，但對亡國前夕的南宋仍寄與無限的同情。宋遺民鄭思肖心史大義略序云：

『海外諸國，懼韃靼垂涎，月貢金銀米帛，充給朝廷軍需，爲屏蔽攻賊計。』

當時海外諸國中對南宋貢金銀米帛最多的，必爲安南。因爲安南受蒙古的迫害最大，對蒙古的怨恨最深，何況安南久受漢文化的薰陶，素與宋人有親密的友誼。正因如此，所以厓山覆敗後宋人逃往安南者最多。

元朝興起，一時武功顯赫無比，安南雖是小國寡民，却對元朝始終表示頑強的反抗態度。元世祖即位，時陳日煚已傳位於其子陳光昺，中統三年（一二二二），封陳光昺爲安南國王，同時諭以三年一貢，仍以訥刺丁充達魯花赤，佩虎符，往來安南國中。

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又諭安南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貢，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賦稅，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註六〇）可知元世祖之視安南，實無異內地各行省。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陳光昺傳位於其子陳日烜，元詔日烜親朝，不聽。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元置安南宣慰司，以卜顏鐵木兒爲宣慰使，陳日烜拒而不納。元立日烜之叔陳遺愛爲安南國王，以新附軍千人送其回國，又被殺害。因此，元朝決意大舉討伐。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鎮南王脫歡統兵往討，次年，連敗越兵，陷安南國都，因暑熱疫作，元軍撤退，爲安南伏兵所敗。至元二十四年（一二七八），脫歡二次往討，安南軍初避銳鋒不與戰，待元兵糧盡撤退時，隨處截擊，元兵又大敗。元世祖因脫歡兩次喪師辱國，終身不許入覲。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立安南行省準備三次大舉，不久元世祖死，纔作罷論。安南所以能够兩次勝元，實由於宋人的鼎力協助。宋人加入越軍抗元者頗多，趙忠便是著名的史例。大越史記本紀卷五陳仁宗紹寶七年（一二八五）四月條：

『官軍與元人，交戰於鹹子關，諸軍咸在，惟昭文王日烜軍，有宋人衣宋衣，執弓矢以戰。上皇恐諸軍或不能辨，使人諭之曰，此昭文韃也，當審識之。蓋宋與韃聲音衣服相似。元人見之，皆驚曰，有宋人來助，因此敗北。初宋亡，其人歸我，日烜納之。有趙忠者，爲家將，故敗元之功，日烜居多。』

元既不能以武力屈服安南，此後安南雖仍常貢方物，實對元室不無輕視之意。元仁宗皇慶二年（一三二三），安南軍三萬北犯鎮安、歸順、養利諸州，殺掠甚慘，事後元移文詰責，安南飾詞以謝，終不得要領，可見陳朝對元的惡感始終未消。

明太祖即位，詔諭海外諸國，時安南王陳日烜在位，立即遣使奉表朝貢。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封陳日烜爲安南國王。明太祖一反元朝對安南的壓搾政策，採取寬大態度，如洪武八年命中書回安南公文云：

『進見之物，須從至微至輕，必來使自捧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不在多，唯誠而已。』（註六一）

洪武末年，安南王室衰微，大權移於黎季犛之手。黎季犛屢行廢立，最後，陳朝末主陳安亦被其殺害（一三九九）。明惠帝建文二年（一四〇〇），黎季犛自立爲帝，自謂出虞舜裔胡公滿之後，復本姓胡，國號大虞。同年傳位於其子胡查（漢蒼），自號太上皇。明成祖永樂元年（一四〇三），胡查遣使入貢，詭稱陳氏絕嗣，以陳氏甥爲衆所推權理國事，成祖封爲安南國王。不久，陳氏後裔陳天平入明，訴黎季犛篡弑之罪，明室始明真相，派兵護送陳天平回國，竟爲安南伏兵所殺。因此，明室決定大舉討伐。永樂四年（一四〇六），張輔、沐晟分由廣西雲南統兵南征，次年，俘黎氏父子檻送燕京。於是改安南爲交趾，設布政使司，置十五府，分轄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不久又增五州二十九縣。安南再歸中國中央政府直接管轄，與內地行省無異。但安南經過四百餘年的獨立，情勢已和漢唐不同，而且明軍入越討黎時，曾以扶立陳氏後裔爲號召，今竟自食其言，改爲郡縣，自然引起越人普遍的反感。陳氏後裔陳頤、陳季擴，先後起兵獨立，均被明軍削平。永樂十六年（一四一八），清化人黎利又在藍田起兵，一面將計就計，製造政治烟幕，佯以擁立冒充陳氏後裔陳高者爲號召。越史通鑑綱目卷十三：

『先是有胡翁者，竄於玉麻土官琴貴所，假稱陳藝宗三世孫，王謀迎致之，改名陳高，立爲陳主，紀元天慶，以應明人。王稱衛國公，代爲高表如明請封。高既立，居空路山，王使黎國興爲傳以監之。』

一面運用遊擊戰術，避實就虛，聲東擊西，使明軍受到莫大的損失。明室不得已，終於退出安南，結束了二十年的郡縣統治。明宣宗宣德三年（一四二八），黎利殺陳高，正式稱帝，國號大越。仿明之南北京，建東西二京，以昇龍爲東京，清化爲西京。黎利既自立，仍須取得中國的承認，因遣使上表，詭稱陳氏既死，子孫並絕，已守國待命。明室令尋訪陳氏的後裔，終無結果。明軍退出安南後五年，明宣宗始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再過五年，黎利之子黎麟，纔蒙明英宗封爲安南國王（一四三六）。自此黎朝諸王，世代受封。至黎灝時（一四六九—一九七），爲黎朝的全盛時代。黎灝以後，大權旁落，先有莫登庸之篡奪，繼有廣南阮氏之對抗，黎王偏安一方，受制於鄭氏，徒擁虛位而已。明世宗嘉靖六年（一五二七），莫登庸逐黎王，據東京自立，國號大越。黎朝老臣阮淦、鄭檢不服，另立黎寧於西京，於是安南分爲南北二國，南爲黎氏，北爲莫氏。黎氏求援於明，明擬起兵問罪，莫氏哀辭請降，明乃削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莫登庸爲都統使，改十三道爲十三宣撫司，但事實上莫氏對內依然維持王國體制。明神宗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黎王以鄭松爲大將，逐走莫氏，收復東京。不久，老臣阮淦之子阮潢，因憤鄭松擅權，起兵攻鄭氏，不克，退據富春，稱雄廣南。於是安南又形成阮氏廣南和黎氏大越南北二國之對峙。由於黎氏大越毗鄰中國，阮氏廣南遠在南方，所以明室只承認黎氏大越，而與阮氏廣南並無正式邦交。

滿清入主中原，時安南仍分爲黎氏大越和阮氏廣南二國。清順治元年（一六四四），黎維祐即位，會中國大亂，過了一年，遣使至福建謁明隆武帝求封，帝即遣使冊封爲安南國王。順治七年（一六五一），明永曆帝詔安南助兵糧，並封黎氏權臣鄭柟爲副國王。至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一），南明亡，黎王始遣使入清貢獻。康熙六年（一六六七），清遣使封黎維禡爲安南國王，自此世代受清冊封。至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廣南西山豪族阮文岳、文惠、文侶兄弟起兵，因得清人集亭、李才之助，勢力日大。大南實錄前編卷十一：

『西山賊阮文岳作亂，據歸仁城。……清商集亭、李才皆應之，岳結以爲助。集亭稱忠義軍，李才稱和義軍。』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西山阮氏攻陷順化，滅阮氏廣南。至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阮文岳乘大越權臣之內爭，又命其弟阮文惠北伐，攻陷東京，滅黎氏大越。於是安南爲西山阮氏所統一。史稱廣南阮氏爲舊阮，西山阮氏爲新阮。阮文岳自稱中興皇帝，以阮文惠爲北平王，阮文侶爲東定王。但阮文惠據東京，勢力坐大，終於不受文岳節制，自稱東京王。黎王失國，乞援於清，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命兩廣總督孫士毅統兵進討，克復東京。但孫士毅小勝而驕，疏於戒備，不久，文惠發動突襲，清軍潰退。阮文惠恐清廷再度討伐，改名阮光平，派使貢獻謝罪。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阮文惠令甥范公治冒充本人入朝，清高宗封爲安南國王。文惠既取得清廷正式承認，氣焰益盛。大南實錄正編卷四阮世祖庚戌十一年三月條：

『西賊阮文惠使人朝于清。初惠既敗清兵，又稱爲阮光平，求封於清。清帝許之，復要以入覲，惠以其甥范公治貌類己，使之代，令與吳文楚、潘輝益等俱，清帝醜其敗，陽納之，賜賚甚厚。惠自以爲得意，驕肆益盛。』

但新阮雖將舊阮逐出廣南，舊阮遺族阮福映仍力圖復國。阮福映初走西貢，後輒轉逃入暹羅，適法教士皮柔（Pigneau de Béhère）在暹，乘機遊說，阮福映遣其子隨皮柔赴法求援，與法訂立同盟條約。阮福映因得法國的部分援助，終於清嘉慶七年（一八〇二）攻陷東京，滅西山阮氏，統一安南，正式稱帝，建元嘉隆，是爲阮世祖。阮福映既復國，即派黎光定入清貢獻乞封，並請以「南越」爲國號。清廷因古南越包括兩廣在內，不准，改名越南，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大南實錄正編卷二十三阮世祖嘉隆三年（一八〇四）正月條：

『帝復遣黎光定等請封，又請改定國號，書略言：先代闢土炎郊，日以浸廣，奄有越裳真臘等國，建號南越，傳繼二百餘年，今掃清南服，撫有全越，宜復舊號，以正嘉名。清帝初以南越與東西粵（即今兩廣）字面相似，欲不之許，帝再三復書辨析，且言不允，即不受封。清帝恐失我國意，遂以越南名國。來書言：從前撫有越裳，已稱南越，今又得安南全境，循名責實，自當總前後所關疆土，肇錫嘉名，其定以越字冠於上，示我國承舊服，而克繼前徽，以南字列於下，表我國拓南交而新膺眷命，名稱正大，字義吉祥，且與內地兩粵舊稱迥然有別。至是清帝遣齊布森賁誥敕國印來宣封，又賜綵緞器皿諸品物。』

法國之援助阮氏，自然包藏侵略的野心，阮氏復國後，屢次要脅履行條約，均不得要領。當時法國由於顧慮中國的干涉，故不敢出以激烈手段。自清廷敗於鴉片戰爭，紙老虎戳穿，法國便肆無忌憚，對越南展開了一連串的侵略行動。英法聯軍之役，法國乘中國之危侵佔西貢，迫越簽訂西貢條約（一八六二）。不久，南圻六省便完全爲法所有。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法國又謀攫取北圻，出兵攻佔河內，於是越南亡國危機一天天加深。光緒九年（一八八三），法國迫越簽訂順化條約，淪越南爲法之保護國。清廷鑒於輿論的激昂，無法袖手旁觀，終於爆發了中法戰爭。但衰弱無力的滿清，遭受列強一再的打擊，已完全失去自信心，所以清軍雖然獲得相當的戰果，最後仍和法國訂約，同意放棄了越南的宗主權。於是越南遂不得不忍受數十年悲慘的亡國生活。

五

前面已就中國歷代政權轉移對於日韓越的影響略加檢討，這裏可歸納出幾點結論：

一、日韓越各國歷史上的重大發展，無不與中國有密切的關係。如日本受隋唐文化的刺激，始有劃時代的大化革新，韓國因唐朝援助新羅平定百濟和高句麗，始有統一王朝的出現，越南因五代十國的混亂，始有自主政權的產生。由此可見中國過去一向

居於東亞政治的主流，日韓越常不免受其政治餘波的震盪。

二、日韓越各國的治亂興衰，常從中國受到重大的影響。每遇中國盛世，各國同樣享受安定繁榮，如當唐之盛世，日本有奈良王朝之興隆，韓國有新羅之全盛，越南也叨唐朝對外貿易之賜而繁榮一時。每遇中國衰世，各國難免也一樣受到災難，如清朝鴉片戰爭失敗後，不久日本被迫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韓國也開始受到列強的侵略，越南亦因失去中國的屏障終於亡國。由此可知中國是東亞的安定力量，中國安定，各國纔能安定，過去如此，今日亦然。

三、日韓越各國古來受漢文化的薰陶，對漢人建立的王朝多抱好感，對非漢人建立的王朝多懷敵意。如宋朝以文弱著稱，日本的平氏政權，韓國的高麗王朝，越南的陳朝，卻都採取積極的親宋政策；元朝武力強盛無比，對日韓越都曾發動多次大規模的進攻，各國卻都不惜重大犧牲，堅持不屈的抗戰。由此得到證明，真能服人的，乃是文化，而非武力。

(註一) 見中國史敘論時代之區分。

(註二) 中山久四郎據史記五帝本紀及尚書禹貢等記載，認為中日開始交通遠在虞舜時代（支那史籍上の日本史頁一五），栗山周一認為漢人約於四千年前定居黃河流域，東渡日本列島當不會遲於三千年前（日本闕史時代の研究頁三三）。

(註三) 見藤田元春上代日支交通史の研究頁一二〇。

(註四) 見栗山周一日本闕史時代の研究頁三四二—三四七。

(註五) 見後漢書鮮卑傳。

(註六) 見稻葉岩吉著滿洲發達史二頁，借用楊成能譯文（載東北叢刊十六期）。

(註七) 關於邪馬台國的位置，過去日本史家約有三說：一、大和說，舍人親王撰「日本書紀」，內藤虎次郎撰「卑彌呼考」主張此說，前者以卑彌呼為大和朝廷之神功皇后，後者以卑彌呼為垂仁天皇之女倭姬命；二、熊襲說，本居宣長撰「馭戎慨言」，菅政友撰「漢籍倭人考」主張此說，皆以邪馬台為九州之熊襲，以卑彌呼為熊襲之女酋長；三、九州山門說，近藤芳樹撰「征韓起源」，星野恆撰「國號考」，主張此說，前者以邪馬台位於九州之肥後，後者以邪馬台位於九州之筑後。總之，就地域言，只有第一說主張邪馬台在本州，其他都主張在九州；就種族言，只有第二說主張邪馬台為熊襲族，其他都不諱言或默認為大和族。

(註八) 參閱黑板勝美日本史研究總說第五章。

(註九) 見白柳秀湖二千六百年史頁八九。

(註一〇) 見宋書夷蠻傳。

(註一一) 參閱李季二千年中日關係發展史頁三一、三二。

(註一二) 見吉田東伍的日韓古史斷，松下見林的異稱日本傳，唯後者稍有不同，以倭王讚爲履仲天皇。

(註一三) 見木宮泰彥日華文化交流史中國南朝文化の影響頁四三。

(註一四) 見隋書倭國傳。

(註一五) 詳拙作東亞各國國號溯源(新時代第六卷第一期)。

(註一六) 參閱劉百閔先生從中國經典東傳論中日文化(中日文化論集(一))。

(註一七) 見大日本史卷二四二諸蕃十一。

(註一八) 見藤原兼實(一一四五—一二〇七)玉葉。

(註一九) 見白柳秀湖日支交涉史話頁一五九、一六〇。

(註二〇) 元軍第二次征日之失敗，中日韓史籍一致載明由於「暴風」或「颶風」，但關於元軍第一次戰役，元史日本傳並未提及風雨，只說「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十四世紀日本初記此役的八幡愚童記、增鏡、太平記等書，都未提及風雨。至十五世紀，李朝編撰的高麗史和東國通鑑才說明遭遇大風雨，再距此約兩百年，十七世紀德川光圀編撰大日本史，才肯定說有大風雨，於是民國初年柯劭忞撰新元史，也跟着說「是夜大風雨」。當夜究竟有無大風雨，實在還是問題。(參閱王啓宗元軍第一次征日考大陸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七期)也許李朝史家的記載，是以第二次戰役遭遇的大風雨誤記或附會於第一次戰役，而日本江戶史家之附和此說，則與宣傳神國思想有關。

(註二一) 木宮泰彥日華文化交流史引勘仲記弘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條。

(註二二) 見明史日本傳。

(註二三) 見柏原昌三蒙古襲來の一批判(鎌倉時代の研究頁二二二—二二八)。

(註二四) 見白柳秀湖日支交涉史話頁二五〇。

(註二五) 見辻善之助日支文化の交流頁一二〇—一二四。

(註二六) 見瑞溪周鳳善鄰國寶記卷三。

(註二七) 豐臣秀吉不受明室冊封，日本史家多謂係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如賴山陽裂封冊詩曰：『史官讀到日本王，相公怒裂明冊書。欲王則王吾自爾，朱家小兒敢爵余。吾國有王誰覬覦！叱咤再蹀八道血，鴨綠之流鞭可絕。地上阿鈞(原註：明神宗名翊鈞)不相見，地下空唾恭獻面。(原註：足利義滿嘗受明冊封，明人諡之曰恭獻。)』(賴山陽詩集日本樂府)

(註二八) 參閱辻善之助海外交通史話頁一九九—二〇五。

(註二九) 見辻善之助日支文化の交流頁二〇〇。

(註三〇) 詳拙作中國文化對日韓越開國傳說的影響(師大學報第十五期)。

(註三一) 韓國史家李丙燾主張衛滿並非外族的系統，係燕國領土內土著朝鮮人的子孫(韓國史大觀中譯本頁二六)，顯然是無根的臆說，因為史記明言衛滿爲燕人，何能詭辯。

(註三二) 高麗朝史家金富軾撰三國史記卷一載新羅始祖赫居世建國，在漢宣帝五鳳元年(前五七)，同書卷十三載高句麗始祖朱蒙建國，在漢昭帝建昭二年(前三七)，同書卷二十三載百濟始祖溫祚建國，在漢成帝鴻嘉二年(前一八)，雖然都是後人臆說，不足置信，但高句麗族和韓族在前一世紀已經開始活動，卻是事實。

(註三三) 見李丙燾韓國史大觀中譯本頁四九。

(註三四) 舊唐書劉仁軌傳云：『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燄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

(註三五) 見旗田巍朝鮮史頁三四，荻山秀雄朝鮮中世史頁三一。

(註三六) 見宋史高麗傳。

(註三七) 見徐亮之中韓關係史話頁四〇。

(註三八) 見高麗史卷二十三高宗十八年十一月條。

(註三九) 見朝鮮太祖實錄卷三癸酉三年二月條。

(註四〇) 見朝鮮經國典卷一。

(註四一) 見明史朝鮮傳。

(註四二) 見清史稿朝鮮傳。

(註四三) 見朝鮮仁祖實錄卷三四丁丑十五年(一六三七)正月辛亥條。

(註四四) 見鄂盧梭著馮承鈞譯秦代初平南越考頁一二二。

(註四五) 見大越史記外紀卷一蜀紀。

(註四六) 見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註四七) 見淮南子卷十八人間訓。

(註四八) 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一九一六年刊，收入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四編。

(註四九) 見史學雜誌第三九編第十號。

(註五〇) 馬思伯樂撰秦漢象郡考，主要的論旨不外四點：一山海經卷十三沅水條云：『沅水出象郡鄣城西。』又鬱水條云：『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是山海經以象郡位於廣西西部與貴州南部；二漢書高帝紀注云：『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

塵。』而臨塵在今南寧府西部；三漢書昭帝紀云：『元鳳五年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鬱林約當今貴州東南部，牂牁在貴州西部。但鄂盧梭在秦代初平南越考第二章中，已就馬思伯樂的論點一一加以駁正。他認為山海經荒誕不經，不能僅據此書考訂古代地理。關於茂陵書的一條，他認為臨塵是臨邑之誤，臨邑就是林邑。至於昭帝紀的一條，他舉出過去中國學者齊召南、錢大昕全祖望等都認為這條可疑，證明這條實無可信價值。不過勞幹撰「象郡牂牁和夜郎的關係」一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主張秦有象郡，漢武帝也曾設象郡，但兩者不在同一地方，昭帝廢止的，是武帝設置的象郡。

（註五一）見水經注卷三七引。

（註五二）參閱鄂盧梭占城史料補遺（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頁一五一—一五四）

（註五三）水經注卷三六引江東舊事。

（註五四）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卷四唐高宗調露元年條：『吳仕史唐改交社爲安南都護府，曰安南（當作交州），曰愛州，曰福綠州，曰驩州，曰峯州，曰陸州，曰演州，曰長州，以上諸州皆我國界。至如湯州，芝州，武峨州，武安州，未必皆安南地，蓋以其疆域與南交聯絡，故以屬都護耳。』法人馬思伯樂（E. Maspero）唐代安南都護府疆域考（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四編），大體同意上述說法，而以陸州屬中國境內。

（註五五）見通鑑唐紀德宗貞元十八年六月。

（註五六）請參閱拙作越南與中國的歷史關係，收入中越文化論集（一）（中華文化出版社）

（註五七）宋史、宋會要作楊廷藝，黎崩安南志略、佚名越史略，作楊廷藝。

（註五八）見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

（註五九）見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八。

（註六〇）見元史安南傳。

（註六一）見馭交記卷三。

（本論文之完成得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補助）